

□ 我与清华

一块金牌：上海市静安区百岁老人金质寿章，是区老龄工作委员会颁赠的。这寿章由老凤祥用千足金特制，章面周围铸一圈百寿图小字，中间是四个大字：福瑞无疆；上方是我的大名汪一鹤及出生年月日，旁边立着一个满脸笑容、手捧大仙桃的小猴

孙（我属猴）；还有一个显目的数字“52”，这说明我是本区第52名百岁之人。这金章铸工精巧，图案既典雅隆重，又觉温馨亲切，其中凝聚着多少党和国家对我的关爱！我手捧金牌，无比激动！

我的老年生活十分幸福。

我的清华岁月 我的清华恩师

○秦匡宗（1952 化工）

1948年夏，我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，同时考上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和清华大学经济系。

我先到燕京报到，但是当年我的南模好友、清华电机系的杨昌琪和化学系的王政人等都劝我上清华。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清华有特别强大的教授阵容，以当年的文法学院来说，陈岱孙、戴世光、费孝通、潘光旦、张奚若、吴晗、冯友兰、金岳霖、钱钟书、李广田等，都是我仰慕已久的大师，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。我就从燕京未

名湖畔的宿舍，搬到了清华的平斋。

第一学期，我的必修课“经济学概论”由陈岱孙先生讲授，“逻辑学”由金岳霖先生讲授，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在1948年夏不幸病故，当年的国文课由李广田先生教授。

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岱孙先生的“经济学概论”。陈先生的课，选修的同学特别多，有一百余人，而当年全校只有一千多个同学。上课是在同方部，这是当年清华最大的教室，仍是济济一堂，为了要占前排的坐位，得在课间跑步去。那时，陈先生不过四十上下，西装革履，神采奕奕，课本是英文的，但他在课堂上则是中英文并用。讲课条理清晰，逻辑性强，有时还略带机智和幽默。1948年12月中旬的一天，我们正在同方部听陈先生讲课，讲到“marginal utility”（边际效用）这一章，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，原来解放军已经逼近清华园了，但陈先生还



2002年，秦匡宗学长与夫人在母校留影

是镇静地讲完了这一课。这是解放前夕我在清华经济系所上的最后一堂课，虽远离经济学已60余年，但是对陈先生当年教的 marginal utility 的基本含义，却至今未忘。

陈岱孙先生当年是清华法学院的院长，也是经济系的主任，我们几个经济系的新同学曾经到他在新林院的家中拜访。一套绿树浓荫下的别墅，是他一个人独居。他热情地在书房内接待了我们，但是当我们把话题转到当时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破产问题时，他沉默了好久，最后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这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。”

1949年1月，清华园解放，但是北平城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水木清华前溜冰，一架国民党的飞机在头顶盘旋。突然一声巨响，是炸弹的爆炸声！我脱下冰鞋，越过小山坡，跑到静斋躲避。只见静斋门前，已经有好几位躲避的人。一位穿着长袍、留着长胡子的先生，也从工字厅的方向急匆匆地赶来。我定神一看，这不是冯友兰先生吗？大家赶紧让他进来，只听他气喘嘘嘘地说：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疯了，疯了！竟然轰炸清华大学！原来冯先生当年是国民党教育部的特级教授，就住在工字厅前的丙所，和校长梅贻琦的住所相邻。而这一颗炸弹，就落在工字厅和丙所之间，炸了一个大坑，幸好没有伤人。一位从古月堂跑过来的女老师对冯先生说：派飞机接你去南京你不去，这不，派飞机来炸你！冯先生就反复地说：疯了！疯了！

1949，是中国历史上发生伟大转折的年代。我，一个19岁青年，在这波涛汹涌、风云变幻的岁月里，驾驭着人生的一叶扁舟，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波折。

1949年2月1日，北平和平解放。我和同学们一起进城，参加了欢迎解放军的入城式，并在城内参加了为时约一周的宣传活动。经《新报》社同志的介绍，我参加了“清华通讯组”的工作。该组织从属学生会宣传部，实际上是由党委宣传部领导，主要任务是每天供给向全校师生在用餐时广播的文稿。我按照领导的意图，在清华园的师生中采访、写稿，经过领导的审阅，在全校广播。我工作得十分起劲，这似乎实现了我当年想从事新闻工作的愿望。一次，当时天津《大公报》改组为《进步日报》，它的采访部的一位主任到清华园来，看到我写的一篇《纪念闻一多和朱自清先生》约有四五千字的文章，希望在《进步日报》上发表。文章在第二天就见报了，还在作者的名字前冠上“本报特约通讯员”的字样。接着，在他第二次来清华园时，说他们的报社特别缺少青年人，希望我能参加他们报社的工作。这件事确实让我怦然心动，但当时“清华通讯组”的领导不同意，我已经参加了青年团，没有组织的同意，当然也就没有去成。

当时北平市的各种机关都缺少干部，通过组织到各大学来要人。清华的原则好像是理工学院的学生基本不放，而文法学院的学生则被大批调走。我们经济系的同学都快走空了，我同班的朋友中，有到团市委机关的，有到市公安机关的，但是没有调我出去，可能与我在学生会搞宣传工作有关。

不久机会来了。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为了渡江南下，在平津地区组织“南下工作团”，大量动员知识分子参加。当时清华有许多师生报名，其中甚至还有一位年已

□ 我与清华

半百的外文系教授盛澄华。我也下决心参加，既然立志要当一个新闻工作者，就必须到革命的浪潮里去摸爬滚打，千锤百炼，在清华园的象牙塔里是没有前途的。这就是我当时参加“南下工作团”的真实思想。

我们组织的全称是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”，团长是当时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。我们所在的一个分部驻地是在东东北大街附近的一座两层楼房内，连长是清华经济系二年级的张一村同学。我被指定为一个排的副排长。因为绝大多数的团员都是大学生，所有成员都按照连级干部待遇，特征是都发了带有四个兜的军服。我们每天清晨跑步上操，然后学习政治，主要是党的城市政策。晚上经常观看部队文工团的演出，例如歌剧《白毛女》、《赤叶河》等。虽然生活很艰苦，大家都睡地铺，伙食是红高粱米饭就咸菜，但是觉得生活很充实。大家情绪高昂，摩拳擦掌，准备南下参加解放战争。

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我突然感到身体不适，发现左胸上部长了一个肿块，于是到四野的部队医院求诊，医生又把我转到解放军的陆军总医院。经诊断为胸膜结核性脓肿，必须手术治疗，可能还需要切除肋骨，并需要一定时间的休养。但是当年的解放军医院的条件很有限，且南下工作团出发在即，所以医院认为转到北平地方大医院医治较为妥当。经部队的领导研究，与清华大学校方协商，决定将我转回清华。

于是，我只好脱下军装，拿着部队组织的证明到了清华的教务处，办理了复学手续。

接下来是治病。经协和医院检查，结论和解放军医院的一致，需要住院手术。但是当时上海尚未解放，我无法与家中联

系，难以筹措这笔医疗费用，只好去找清华大学的领导。

我找到了负责学生工作的教务长周培源教授，他了解了我的情况，就安慰我不要焦虑，他一定想办法。一位著名的学者，对待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学生，那么热情、慈祥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当年协和医院院长的一位女儿，正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，周先生通过她与协和医院联系，很快就通知我，可以按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的“社会服务”办理，一切费用全免。这样，我就顺利地住进了协和医院的胸外科病房。

这是一间普通病房，但是很宽敞，住有十来个病人，医院的服务非常到位。我的主治医生是吴英铠，著名的胸外科专家，后来担任我国医学科学院的院长。他对我说，你这个肿块是结核性的，它会入侵到肺部，造成“脓胸”，所以必须早日手术切除。当年在查病房的时候，协和还有美国籍的大夫，在他和吴大夫交谈中，我听说美国现在已经有了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，这类病已经不一定需要手术，但是我们这里还没有，只能是手术治疗。后来我知道，他当年说的特效药就是链霉素、雷米封等抗生素。

手术前需要亲属签字，我当时是举目无亲。陆庆邦同学就代表亲属为我签字。当我在手术后从麻醉中醒过来时，看到病床边站着的也是陆庆邦和王霏同学，都是清华和我同一寝室的南模校友。

是年4月4日，我病愈出院。这样，南下或者工作都是不可能的了，只有回清华上学。

这时，我开始考虑自己前途的选择。

经济系的同学已经走了一大半，而当时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大功告成的认识，和对国家即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向往，使我最后决定改学理工。因为中学时代对化学比较爱好，所以想转到清华化工系学习。

于是，我第二次求见教务长周培源先生，他对我病愈表示高兴，但是关于转化工系的事，他说清华有明文规定，文法学院的学生要转理工学院，必须重新补考数理化三门课，这一点没有通融的余地。我又找了化工系的系主任曹本熹先生，他也是同样的说法。我权衡了一下，补考数理化，还不如重新考一次大学，因为我相信其余的三门课，国文、英文和政治应该是我的强项。这样，我就又一次在北京考区报考了清华的化工系。

离开中学已经整整一年，这一年中几乎没有和数理化的课程有过任何接触，更谈不上系统的复习。我到大图书馆借了几本有关的参考书翻了一翻，就这样上了考场。

考场就设在清华体育馆，离我的宿舍平斋不过一箭之遥。六门课程考完五门，我的自我感觉良好。最后一门是英文，按规定是下午两点开始。我吃过午饭，在宿舍内休息，不知不觉睡着了，因为当年暑假上海已经解放，我的同屋同学都回家探亲去了，就我一人独住一屋。一觉醒来，大事不好，已经两点一刻！我飞快冲向体育馆，见大门已经关闭。我只好敲门，开门的正是当天的监考周培源先生。他一见是我就说：“秦匡宗，你怎么迟到了半个小时？”我只好说：“身体不好，睡过了。”他踌躇了一会儿说：“还没有一个考生离开考场，你就快去参加考试吧。”这真是法外开恩，要在如今，那是门也没有。我

连忙就位，考题其实不难，无非是英译中、中译英和一篇短文。一个半小时，我按时交卷。

短短半年之内，我和周培源先生打了三次交道。这位我国的著名物理学家，爱因斯坦的学生，对一个青年学生的那种爱护备至和热情关怀的精神，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头。

等到高考发榜，清华的北京考区我榜上有名，但是取在化学系。我去找曹本熹先生，他说化工系欢迎你！就这样，我办了转学化工系的手续。我得感谢南模在中学时代给我打下的比较扎实的基础教育，使我能整整一年之后，没有经过什么复习，还有能力从容应对清华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。

当年我作为《新报》社的一员，负责采写清华园内的新闻，曾经到马约翰先生的家里访问。他十分喜欢和青年人交往，我向他请教健身之道，他特别强调一个人要身体健康，一定要保持精神愉快。还给我们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：在抗战时期，西南联大不能按时给教授发放微薄的工资。有一天，马先生家里没米下锅了，他夫人让他到朋友那里去借一点米，他没有去，却到郊外田野里的一棵大树下躺了半天，他说因为大树下空气好，又充分休息，所以也不觉得肚子饿。天黑回家，还是他夫人去借了米下的锅。他很关心同学们的伙食，担心年轻人的营养不够，劝导同学要学会休息。

现在，清华的老体育馆南侧，建了一座马约翰先生的铜像，我每次有机会去清华，总要去那里徘徊片刻，缅怀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，以及他对青年人的真诚关爱。